

# 论周扬文艺思想民族性的早期表现

韩立平

(国家开放大学 组织部,北京 100039)

**【摘要】**周扬文艺思想是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上不可绕开的一个研究对象,尤其是有关周扬文艺思想“民族性”这一特征的研究。本文结合周扬在20世纪所处的社会环境、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文学创作情况,研究周扬文艺思想民族性的早期表现和形成原因。

**【关键词】**周扬;文艺思想;民族性;传统教育;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724 (2021) 03-0033-04

周扬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思想史上的一代宗师,文学理论家仅是多重社会身份中的一个,在论述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史时很难绕开周扬来谈。但是对周扬文艺思想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却相对较少。尤其是以学术专著形式呈现研究成果很少,在目前可以找到的著作中,涉及周扬文艺思想研究的不过几本而已,多数为传记类和回忆性的著作。研究周扬文艺思想的硕博论文也只有二十多篇,而且基本都是以硕士论文为主。研究周扬文艺思想的期刊论文相比于专著和硕博论文来说,数量要多一点,但相对于周扬在20世纪的文学界地位来说还是显得很少。综观这些研究成果,发现学术界对周扬早期文艺思想出现“民族性”这一特征缺少研究,更多的是研究周扬关于典型论、现实主义和大众化的问题。

## 一、周扬及其文学创作前期

周扬(1908-1989),生于湖南益阳。原名周运宜,笔名起应,1934年以后主要使用我们最为熟悉的名字“周扬”。周扬从小家境还比较殷实,不过家中除了比他大两岁的哥哥之外,并无其他男丁,因此免不了受乡人欺负,故从小立志快快长大成人,为家里分忧。不过家中祖母和母亲对其非常溺爱,周扬人生的前十四年都在家中学习《资治通鉴》等传统文化材料。周扬从小的古文学学习为其打下良好的古文功底基础。

1922年,周扬因不忍家中种种事情,他砸碎

家中神龛和祖宗菩萨塑像,离开家后相继到长沙补习学校、挪威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信义中学、上海南方大学、上海国民大学、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基本上接受的都是不同于其人生前十四年的教育,尤其是在1926年转入上海大夏大学时,就读于英文系,受到了李石岑和大夏大学革命与民主精神的影响,曾醉心于尼采主义和其他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学习,这也是周扬接受革命思想和学习英文开始的地方,这一教育背景可以说影响了周扬的一生。

1929年,周扬东渡日本,此时的日本正是左翼文化蓬勃发展的时候,也是马列主义学习的高潮之时。这一年,周扬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左翼书籍,还加入了中国青年艺术联盟,与同住在“国师馆”的邻居方信讨论文学方面的问题,介绍有关文学方面的作品给谭林通。不过,周扬这一“左”倾行为,使其在日本大检举时期被捕,后得到方、谭的保释,之后就从日本回国,开始翻译和写作的生活,尤其是对于有关苏联的文学艺术作品,“当时遇到英文书籍中有关苏联文化艺术的资料,便先睹为快。不论其内容价值如何,迅即移译,以供参考,兼获少许报酬,以资糊口”<sup>[1]</sup>。周扬从日本回来之后,由赵铭彝介绍加入摩登社,随后摩登社并入大道剧社,其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参演了根据苏联小说改编的三幕剧《玛特迦》,但由于自身方言口音很重,曾对赵

**【收稿日期】** 2020-06-11

**【作者简介】** 韩立平,男,安徽和县人,国家开放大学实习研究员,研究方向:文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铭彝说：“我终归不是演戏的材料，还是写文章的好。”<sup>[12]</sup>于是，在1931年底，周扬经夏衍介绍由剧联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据夏衍回忆，那时候的周扬“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装，特别讲究，欢喜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潇洒”<sup>[13]</sup>。可以看出，此时的周扬是深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这也符合之前他离家出走时所表现出来的性格。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30年代周扬无论是出于生活需要还是学习需要，他翻译了大量苏联的或者有关苏联的作品，这些作品对周扬的文艺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周扬在1932年翻译的《果尔德短篇杰作选》，由上海辛垦书店出版，这让周扬认识了什么是无产阶级文艺。他还翻译了美国佛里门《苏联的音乐》，在《译后记》中介绍作者和作品，在其中说明了苏联五年计划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初步探讨了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

## 二、周扬文艺思想民族性的早期表现

1932年周扬就左翼文化界“文学大众化”这一问题发表《关于文学大众化》一文，针对当时“欧化”倾向以及轻视民族传统的倾向，提出了“文学大众化首先就是要创作大众看得懂的作品”<sup>[4]26</sup>。这就需要学习群众的口头语言，创造新的语言，然后对大众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提出看法，这些都是为了使文学与群众的距离拉近一些。1934年，周扬以笔名“企”在上海《大晚报·火炬》上发表《国防文学》一文，引起了当时文学界“两个口号”的大争论。相继，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中认为“国防文学不是狭义的爱国主义文学，但如果没有强烈的民族的情感浸透着，就会减少它对于读者的艺术的申诉的力量”<sup>[4]172-173</sup>。这里将“民族”这一元素在艺术表达力上的作用表现为不可小觑的地位。在1936年6月《光明》第1卷第2号中，周扬发表《现阶段的文学》一文，在文中，周扬认为“对于国防文学抱着怀疑的人都是不同意于国防文学的这个全民族的性质。……凡是站在民族的和真正人民观点上的文学在现在都有充分的积极的意义”<sup>[4]179-180</sup>。在这一点上，周扬清楚地讲明白了“国防文学”以及其中的“民族性”特点，不能将文学的性质放在狭隘的“民族”中，要让它真正地适用于民族，体现其真正的民族性。因此周扬在文末提出“国防文学不但要描绘民族革命斗争的现状，同时也要画出民族进展的前面的远景”<sup>[4]184</sup>。这不仅是对国防文学提出的新希望，更是对整个文学艺术提出的新期许。

1937年周扬离开上海来到延安，与毛泽东相

见，希望可以谈谈上海文艺界关于两个口号之争，同时也希望检讨自己与鲁迅、茅盾等人没有处理好关系的错误，并诉说自己在争论中的委屈。虽然在这一场谈话中，没有说到以上这些内容，但周扬却被毛泽东的睿智所折服，摆脱在上海后期所产生的抑郁心情。深受毛泽东启发后，周扬在1938年发表《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一文，针对中国文学旧有的东西进行了分析，认为作家对旧形式虽然进行了尝试性的改造，但是“我们的作家常常吸收民间文艺中庸俗的、低级趣味的东西，而没有汲取它那明朗健康的真正大众的要素”<sup>[4]252</sup>。其中的问题周扬总结有二：一是，对旧形式和新内容进行极不协调的结合；二是，对旧形式进行无批判的照旧采用。因此周扬认为：“我们的作家应当一面研究旧的，一面探寻新的，使小形式在抗战中成长发展到可能的完成的极限。我们现在所要求于作家的就是用这种大众化的小型作品敏速地去反映当前息息变化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离开实际，关起门来去创造什么‘伟大的作品’。”<sup>[4]252</sup>周扬此时认为文学的创造要贴合实际的发展变化，继承传统性的部分，创新新形式，来符合大众的需求，而这种新形式肯定是适当的。文中还明确了中国新文学应走的道路，最后，周扬还认为：“保存过去新文学的一切优良成果，继承它一贯来的现实主义的传统精神，把这些成果和传统在新的现实中发扬光大；继续文艺大众化的路线，学习大众的活生生的言语，研究民间文艺形式，摄取其中的长处和精华，把大众化的路线贯彻到底，中国新文艺就在这个为更深入于现实，更深入于大众而斗争的旗帜底下迈步前进，展开在中国新文学面前的将是一片无限辽阔的新天地。”<sup>[4]256-257</sup>其中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中国新文学的道路，周扬特别提出了传统和民间文艺形式要深入现实，也就是说中国新文学的道路要兼具传统性、民族性和现实性，才能更好地让文艺与民族解放运动密切相结合。

1939年2月在《文艺战线》创刊号上周扬发表创刊词《我们的态度》，在文中再次提到“在文艺修养方面，我们的作家几乎全是受西洋文学的熏陶。一个落后的国家接受先进国家的文化的影响，是非常自然而且必要的；我们过去的错失是在因此完全漠视了自己民族固有的文化”<sup>[4]262</sup>。此时周扬在这里已经意识到了文学艺术界对于文化传统的冷淡和不屑是有问题的，要想实现文艺的大众化，这种态度必须要改变，不仅要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更要关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坚持在“以我为本”的基础上进行学习和吸收。因此，周扬再次补充到，“不深通自己民

族文化的人,在文化问题上决不会成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因为他不能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来丰富国际文化的内容,他对于国际文化将是一个寄生者,而无所贡献”<sup>[4] 263</sup>。这里将“传统性和民族性”与“民族性和国际文化”这两组关系论述得非常清楚,而且其中突出了民族性的重要性。这正好体现五四以来,新文学艺术所倡导的欧化思想已经表现了不合时宜,对现实的中国进行全盘“西化”出现了危机感和对资本主义文化已经开始腐烂等一些现象有了清晰的认识。因而周扬提出振兴中华民族获得民族解放,必须把“民族性”提上来,“在民族的巨大的事变面前,只有最坚定地把握民族的立场,最高度地发挥民族精神的文学,才能成为伟大的文学”<sup>[4] 279</sup>。

在1940年2月《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周扬发表了《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其中也谈到“民族性”的问题,文中认为中国早期出现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已经受到了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并从中学习和吸取到了一些符合中华民族文学艺术发展需求的东西。但这些容易给人造成中国的文学艺术已经和旧有的文艺形式割裂了的错误感觉和认识。因此,周扬提出“旧形式具有悠久历史,在人民中间曾经,现在也仍然是占有势力,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及半封建的旧经济旧政治尚在中国占优势的反映”<sup>[4] 293</sup>。这就需要考虑到旧形式巨大的影响,必须利用好旧形式,发展新形式,“把民族的、民间的旧有艺术形式中的优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艺中来,给新文艺以清新刚健营养,使新文艺更加民族化、大众化,更为坚实与丰富”<sup>[4] 295</sup>。因此把握好旧形式,不但有利于新形式发展,更有利于促进文艺的民族化和大众化。那么对于“欧化”和“民族”这两个概念问题,周扬认为“不错,新文艺是接受了欧化的影响的,但欧化与民族化并不是两个绝不相容的概念”<sup>[4] 298</sup>。为了更好地论述这个观点,周扬举出鲁迅创作的例子,他认为鲁迅是深受苏联的影响的,但是他并没有照抄苏联,而是运用中国式的笔调进行创作,“《狂人日记》以及其他短篇的形式虽为中国文学史上所从来未有过的,却正是民族的形式,民族的新形式”<sup>[4] 298</sup>。如何建立中国文学新形式,体现民族性的特点,周扬在此就给我们在研究“十七年”时期文艺思想民族性提供了很好的解释理由。在这篇文章中周扬还提出要处理好对民间文艺的整理和研究问题,并认为:“对这工作也还没有完全正确的态度,还没有把吸收民间文艺养料看作新文艺生存的问题。”<sup>[4] 302</sup>可以看出,此时周扬的文艺思想是要处理好新文艺与旧形式之间的关系。

1942年9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周扬发表《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一文,其中强调“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之鄙薄的态度必须改变。整理与研究遗产的工作必须和创造民族形式的任务紧紧地联系起来。自然,西洋的艺术遗产还是应当在正确的态度下大量吸收。过去这个工作也是做得不够的”<sup>[4] 422</sup>。因此,周扬在1944年3月21日发表的《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之后》一文中,将大众化的秧歌运动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总结,将大众化与民族化相结合,以此促进文学艺术为人民群众服务。1946年6月25日,在《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编者的话”中又谈到这一问题,并认为这些作品是创作的具体实践,“在内容上,这些作品反映现实虽然还是非常不够,但它们终究反映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新的生活与新的人物。在形式上,我们也已经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出一种新的风格,民族的、大众的风格,至少是这种风格的萌芽”。此时的周扬发现现在的作品不仅拥有新的内容,而且还出现了新形式的萌芽。于是,1947年在晋察冀边区文艺座谈会上周扬提到:“现在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利用旧形式’了,而是对民间形式表示真正的尊重,认真地学习,并且开始对它加以科学地改造,从这个基础上创造新的民族形式出来。文艺上的民族新形式正在生长与发展的伟大过程中。……群众一定会挑选出最适合于他们的,因而也是最应合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而一切不适合的东西,最后必然要受到淘汰。”<sup>[4] 503</sup>可以看出,周扬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非常重视文艺民族性这一问题,并且还认为其中人民群众这一因素存在着巨大意义。

### 三、结论

通过梳理周扬1949年之前的人生经历和文艺思想中的民族性早期表现,我们会发现周扬人生际遇中有几点对其早期文艺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也让他的文艺思想产生了民族性这一特征:一是,年幼时期受到过多年的传统式教育,在周扬的内心扎下了深深的传统文化根基;青年时期大量接受“西化”思想和西方现代思想,与传统思想发生碰撞,经过多方较量,产生中西兼容的想法。二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国家正处于动荡时期,民族出现危机,西方的新思想新技术是要学习,但是西方的资本主义也产生了腐败的气息,而中华民族如何实现解放,如何实现独立,就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新思想新文艺,吸收西方文艺思想的优秀部分,利用中国文学艺术旧形式,创造文艺新形式,为人民群众服务。三是,1937年周扬从上海来到延安,开展边区文艺界抗战,深受毛泽东为人民

群众服务思想的影响,尤其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周扬文艺思想的民族性特点有了理论的依据和思想的依靠。由此,周扬早期文艺思想由其人生的境遇和政治的影响而产生的民族性特点渐现雏形,这也奠定了“十七年”时期周扬文艺思想民族性的基础。

#### 【注释】

其中有多处材料如2013年第2期《现代中文学刊》所发表的吴敏《周扬简谱初编》、2009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罗银胜《周扬传》都认为周扬出生日期为1907年,而本文对周扬的出生时间界定是根据新华社发布的《周扬生平》所定。

周扬辑. 解放区短篇创作选 [M]. 华东新华书店, 1949年版。本书其中第1辑为短篇小说,第2辑为散文

报告,于1946年11月由东北书店出版;1947年7月至9月,东北书店、光明书店的再版本依初版重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苏南、中原、湖北等地新华书店重印时,将两辑合为一册出版。《编者的话》未变,但篇目略有变动。

#### 【参考文献】

[1] 赵家璧. 编辑忆旧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39-40.

[2] 董懿娜. 赵铭彝关于一个世纪的回忆 [J]. 新文学史料,1999(4):119.

[3] 李辉. 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 [M].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35.

[4] 周扬. 周扬文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On the Early Manifestation of the Nationality of Zhou Yang ' s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

HAN Liping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Beijing 100039)

Abstract: The study of Zhou Yang's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 is an unavoidable research object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20th century, especially the "nationality" of Zhou Yang ' s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 This paper will combine Zhou Yang's rich life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creation with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the 20th century to study the early manifestation and formation reasons of Zhou Yang ' s national character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

Keywords: Zhou Yang;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ought; Nationality; Traditional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